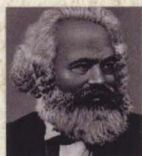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Wisdom: A New Approach
to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Wisdom: A New Approach to Practical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Wisdom: A New Approach to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An Inquiry into Subject Towards Practical Wisdom: A New Approach to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versing



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

——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夏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

——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

Traversing the Historical
Time-Space of the Capital: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Base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夏 林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 ·

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

——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

著 者 / 夏 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魏小薇

责任校对 / 贾凤彩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3

字 数 / 384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428 - 8/D · 0174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伟大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文明丛书》序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这既是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如果说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用枪炮使中华民族第一次直面他们所输出的“文明”——一种扭曲的和以野蛮的形式表现出的现代文明的话，那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则是中国人自觉地进行自己的现代化运动的尝试。这些尝试不论涉及的是新的物质文明生产方式还是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都先后以失败告终。在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民族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层面上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民才真正地开始自己气势磅礴、创造历史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主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文化基础的核心和理论支柱。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选择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创了中华民族迅猛地迈向现代文明的崭新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应该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理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结合起来的，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现代化的事业的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断地走向辉煌，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走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解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不同历史阶段现实问题中凝结而成的思想精华。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相结合，并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文化核心，既是历史的机遇，又是时代的必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只是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机遇来说的。而从时代的必然性来看，当资本主义的文明以枪和炮、血与火的形式与中华民族遭遇的时候，中国人民一方面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落后，产生了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以血与火、枪和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和文化的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上的反抗和深刻的思想上的反思。这种以血与火、枪和炮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文化就是我们追求的现代文明吗？有没有另一种不同的现代文明形式呢？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与其说是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论战，不如说是对新的中国式的现代文明的寻思——对一种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明形式，又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全新的文明形式的思考。“五四运动”时期所产生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主义，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不正是人们对新的现代文明形态的思考和理论诉求吗？而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的一开始就是一种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反思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不仅触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对它的制度和文化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而且勾画了一个超越既有的所谓“自由”、“平等”的社会制度安排的，以追求“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崭新文明形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的批判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的，而是要解答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致命性问题，要致力于探讨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的“自由王国”。马克思在理论上所探索的东西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所追求的东西。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运动相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现代化不断地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台阶，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新的发

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等。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所为之奋斗的历史目标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崭新的东方文明国家，是一种新的现代文明形式。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这样的新的文明形式，就是要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实现。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的一开始就探讨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文明形式——一种超越既有的形式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实现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的革命和实践也是要实行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现代文明形式——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运动，既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必然要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反思，离不开对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深刻思考。离开了对现代文明的深入思考，离开了对中国现代化实践活动的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就成为脱离实践基础的空中楼阁，成为无根基的形而上学的玄思。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在这里，我们的语言“放假了”。反之，如果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么就有可能使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偏离从物的奴役和人对人的奴役中摆脱出来的“人类解放”这一现代性的主题，而滑入一种“野蛮”的现代性。由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实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不断深化的现代化运动结合起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真正地结出累累硕果；同样，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所走过的曲折老路。这就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的根本立意，也是我们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基本思想。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因为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阐明自己的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和认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学者甚至直接把马克思主义贴上“批判理论”的标签。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批判的哲学。马克思本人强调，他的理论工作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因此，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批判的哲学，又是建设的哲学；既是革命的理论，又是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就是在批判资本主



义文明形式的基础上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建设“自由王国”的可能性和途径的。如果落实到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来说，那么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既要有批判，也要有建设。从批判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不断地反思迄今为止的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矛盾、挫折和教训，批判一切反文明、反文化和反人类的丑恶现象，深入思考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自我矛盾，特别是受资本主义现代化影响而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探讨这些问题、矛盾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从建设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积极地思考建设新形式的现代文明的可能性和途径，探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途径和方法，努力避免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实际上的新奴役结局，努力以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新的文明价值校正我们实践中的偏差，把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自由王国”的理想和现代化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为当代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近年来，中共中央一再提出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战略要求，并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的战略高度来阐述这种要求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本丛书的主旨就是要为这个建设工程贡献自己的力量。它立足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向度，坚持从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以及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吸取营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贡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精神上的资源和价值上的引导，而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的传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中国的现代化结合起来也必定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作出贡献，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肩负的时代使命。

前言

——拜物教视野中的现代性

商品拜物教……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想用这个词语来捕捉市场遮掩社会（以及，我们应该加上地理）的信息和关系的方式。我们无法仅仅看到商品，就能分辨出它是由意大利合作社的快乐劳工生产的，或是由南美洲在被隔离的情况下，遭受严重剥削的劳工生产的，还是由瑞典受到适当的劳动法与工资协议保护的受薪劳工所生产的。超级市场货架上的葡萄不会说话；我们看不到上面的剥削指纹，也不能立刻指出它们来自哪里。藉由进一步的探究，我们就能揭去披在地理与社会的蒙昧之上的面纱，让我们警觉到其中的问题。但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必须走到市场所显示的现象之后与之外，才能理解社会是怎么运作的。这就是马克思要做的工作。我们必须走到面纱、市场拜物教和商品背后，以便把社会再生产的完整故事说出来。

——大卫·哈维

一 拜物教与现代性的基础

拜物教是个外来词，在英文里是 Fetishism，指人对某种特殊物质的崇

拜。在辞典中它有宗教的和宗教以外的两层含义：“拜物教（fetishism），宗教信仰的原始形式之一。与‘拜神教’相对。该词来源于葡萄牙文 feitiço，意谓巫术。”^① 其产生是“原始人由于对自然现象缺乏理解，以为许多物体（如石头、树木、弓箭等）是有性灵的，并赋以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对它们祈祷、礼拜或祭献，即可获得嘉惠与庇佑”。这是宗教意义上的拜物教。此外“拜物教一词也用来比喻对某种事物的迷信，如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等”^②。马克思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即非宗教的意义上使用“商品拜物教”一词的。它表明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们对待商品的态度就如同宗教里对待神灵一样，顶礼膜拜，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形成了商品拜物教，并进而发展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商品拜物教就是物化的生产关系对现实个体的统治。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不光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它还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交换价值这个抽象的中介借助于资本的扩张、借助于对剩余价值追求的内在推动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换算成了物的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借助物的或物与物之间的自然属性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的总是把人的东西规约为物（商品）的状态。”^③ 社会关系物化与商品拜物教讲的是同一回事，都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的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只是二者侧重点不同而已。商品拜物教是从具有了神秘的、微妙的人类特性并被奉为偶像的商品这个角度，即客体主体化的角度来讲的；而物化则是从具有了物的特性的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即主体客体化的角度来讲的。正如卢卡奇所言：“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④ 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是拜物教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就是现代社会人物颠倒、人为物役的异化现实之表现。

上述情况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商品拜物教既是一种世俗化的残余意识形态，又是经济系统中具有实际功能的控制原则。”^⑤ 这一控制原则以资本对劳动力的奴役为其典型形态。唯此，对于本应作为主体的人来说，对

① 冯契、徐孝通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第611页。

② 《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缩印本，第1452页。

③ 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sed Share*, Volume 1, Zone Books, New York, 1991, p. 129.

④ [匈牙利]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147页。

⑤ [德]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9页。

象化活动就成为一种奇怪的自身缠绕：人受缚于自己的创造物，就如同自己给自己铸造锁链，主体性的自我发挥同时就意味着自我拘束。“在中世纪制度下，资本是为人服务的；而在现代社会里，它却成了人的主人。”^①这一悖论性存在便构成了启蒙理性对现代性基础的认知所越不过的界限。

关于现代性，一般认为就是主体自由，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首先就是主体自由。这是西方现代性讨论的原初语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研究至今没有脱去的自我意识抽象原罪。如果把现代性置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形而上学两重语境中，就可以发现，现代性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由自我意识向现实生存基础深入、再向形而上学领域回归的双向交替过程。一言以蔽之，在商品拜物教的视域中，现代性就可以理解为“商品向着世界的转变和世界向着商品的转变”^②，这才有齐美尔“分析货币是为了抽绎出整个时代精神”^③。

现代性这个概念来源于“现代”一词，“‘现代的’这一词最初是在5世纪晚期开始被使用，当时是为了将刚确立正式地位的基督教同之前的异教——罗马历史区分开来。‘现代性’的多变内涵一直体现着时代的意识”^④。可见，“现代”概念一开始就指向某种时代精神，具有自我中心性意蕴。“现代性”一词本身就蕴涵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就是要通过对当下的反思，达到对时代生存意义的澄明，甚至永恒。一般认为近代是波德莱尔首先明确提出“现代性”一词，作为一种对当下时代之异质于古代的心理感受，“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的和不变的……”^⑤毫无疑问，“现代性”是要从当下的偶然易逝达到不变的永恒，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上，为人的存在寻找最终极的根据。当“现代性”成为形而上学的对象，或其本身作为形而上学来加以讨论时，它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就纯然是对人的历史境遇的体验以及对永恒的追求了。正如卡利内斯库所说的：“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从波德莱尔到本雅明乃至以

① [美] 弗罗姆：《对自由的恐惧》，许合平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第77页。

②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and Red Press, 1970, p. 66.

③ [德] 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第206页。

④ [德] 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见汪民安等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册），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第108页。

⑤ [法] 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485页。

后，现代性概念显示出了容纳任何一种对现时及其意义的哲学解释的能力，无论这种解释是美学、道德、科学、技术的，还是更广义的历史—社会的，也无论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①这正是现代性成为我们时代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的重要原因。因此，现代性是一种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态度，一个社会只有具备了自我批判意识，才有可能现代的。现代性作为一种自我意识，是現代人对自身所处时代状况的一种自觉、人们对当代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的自省，一种普遍的意识共同体，也就是明确意识到我们时代的独特性和自我中心性。

有了上述背景，我们甚至可以以现代性为视点反观近代形而上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自笛卡尔始，形而上学的目的就是要为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寻找到一个确实可靠的基础，经过康德、黑格尔，这一点都是被置于先验统觉或自我意识之上，主体性形而上学就是现代性，或者说它表达的就是现代性的主题——主体自由。现代人的本质立基于此，人的意义也在于此，这自有其时代历史意义。正因为现代性始终囿于形而上学领域，主体性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也就必然要影响到现代性的进展。对人的存在的一味形而上的追求反而使人遗忘了生存基础本身，这一生存基础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如果说关于现代性的思考过去一直遵循从人间升到天上的理论导向，那么，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则是从天上下到人间，由人的生存基础出发说明人的价值与意义，最后上升到对整个时代的历史命运的思考，对人生意义的探求。这样一来，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就实现了对传统异化逻辑与主体性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破除。

那么，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的拜物教理论对形而上学有什么作为？这直接关系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思考如何与之前现代性形而上学意境相关联的关键所在。一句话，从马克思拜物教理论出发能够说明之前乃至当前的形而上学吗，能够说明近代以来哲学由人间升到天上的过程吗？回答是肯定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二重性和剩余价值生产所做的具体分析。对于这一点，西方现当代思想家们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达成了某种共识，尽管其意义有时不是被明确觉察到。阿尔都塞、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不少思想家都意识到了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在知识结构上是一种

^① [美] 马泰·卡利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341页。

类似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类型。阿瑟也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阐述的社会关系和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对应关系的基础，在于交换的‘抽象性’。……‘价值’的交换范畴是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而价值可以被证明为物质事物之间的一种‘形而上’的关系。”^①这种微观的、具体的指认也许是对那些指责马克思没有哲学或过早告别哲学的论调的最好反驳。他们对哲学的看法就是对现代性的看法，就是自我意识的自足性学术话语。

马克思不光对近代的形而上学做了由天上降到人间的基础性置换，还对哲学由人间上升到天上的过程本身进行了批判性的阐发。对这一过程的揭示已经达及了对人的生存基础的科学说明、人生存在意义的具体揭示以及对人类历史前景的合理展望。这一双向过程既把握了理论，又把握了历史，是我们的时代精神之体现。站在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立场上看待现代性，就是历史辩证法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就是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生成与扬弃，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的批判性阐释。现代性作为观念形态上导源于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历史事件，其本身的理论确证缺乏真正的批判性，总是将自身等同于理性及其现实展现，这是其囿于商品流通领域的现代性抽象原罪，不能深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因而，启蒙现代性最终所达到的只是对商品货币拜物教的觉察，不是对资本拜物教的批判，其立场只能是拜物教的自我确证。

二 拜物教与现代性问题的变式

通过剖析商品拜物教与现代性的关联可以发现，从康德以来理论形态中一再强调的理性本身的先验性的基础就在于现实社会生活，在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阐明这一点，既是对启蒙理性所标榜的统摄性即先验形而上学的根基在于商品拜物教的抽象同一性，也即现代生产方式对具体个体的统治的揭露，同时又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而上学意义的揭示；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又是从具体追溯到抽象领域的过程。这也表明对现代性的揭示必须遵循辩证法，也意味着超越了把现代性囿于自我意识加以定位的讨论背景。

^① 参见〔澳大利亚〕杨·亨特《马克思的商品生产论》，见《现代哲学》2005年第3期。

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哲学所面临的的就是现代性问题，这可以从康德物自体范畴及其展现出的古典哲学的发展趋势得到剖析。康德物自体范畴蕴涵着两重意境——本无与本体——分别表征自然与自由，同时物自体范畴也表现出两个维度——现实性与批判性。这实际上是现代性觉悟的开始，因为，通过物自体范畴，康德既提出了纯粹的人对自然的关系，又反思、批判了这种关系，这种反思的结果就是实践理性，就是物自体社会关系之维。物自体不是科学所能把握的对象，它使哲学的对象成为一种反思的关系，也就喻示着人的社会生活进入哲学关注的视野，这标志着现代性的觉悟与肇始。

“哲学研究的‘物自体’就是人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①，其社会背景便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普遍必然性——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是现代人的历史境遇，同时构成了现代性的基础，包含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交换价值与自我意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意识的德国古典哲学从一开始面临的的就是现代性问题，康德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二分法是现代性矛盾的初始理论意识，而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则是现代社会分裂的最抽象理论表达。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使现代性讨论从抽象达到了具体，也即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把握。

在《判断力批判》中，当康德以审美判断力弥合他前两个批判造成的裂隙时，他的这一举动同样意义深远。康德的审美判断提供了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最初的、但并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此后，审美在当代西方思想家那里甚至成为另一种现代性担负起解困启蒙现代性的重任，这在康德的物自体学说和判断力批判中就已蕴涵着其初始可能性。

总而言之，康德对现代性的影响不光是《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还包括《判断力批判》，三大批判共同构成了支撑现代性的批判母体。具体说来，《纯粹理性批判》意识到了抽象的人对自然的关系的虚无性，意识到了现代社会的分裂；《实践理性批判》则把哲学研究的主题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向现代社会生活；《判断力批判》体现了弥合现代性分裂的初步尝试，提供了第一个包含张力的现代性解决方案。此后的古典哲学就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自身。如果说康德通过“物自体”首先开始了对

^① [捷克] 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第191页。

现代性的觉识，那么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就成了负载、暴露现代性问题的最大媒介。这越发明现代性问题构成了古典哲学的探讨主题，它甚至开启了日后所谓两种现代性理论的先河。正因为古典哲学囿于商品拜物教而不是对资本的深刻剖析，它对现代性的理解自始至终局限于流通领域，这对后来的启蒙现代性论者们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明白了从康德以来形而上学所生发于其中的社会基础及其所要着力解决的人的历史命运问题，我们可以反过来审视康德所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哲学史上划时代的问题和它对后来思想家们现代性解决方案的影响。

当康德提出形而上学要从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问题入手时，这一举动同样意义深远。他一再强调，要想做成判断，获取知识，除了具备先天性的感性或知性形式之外，经验的作用也不可或缺。这实际上是对从柏拉图以来传统理念论的一个纠偏。因为康德在这里所谈的最终并不只是个知识问题，更是人的存在价值的确定性、真实性问题。从柏拉图开始，哲学所着力趋向的是理念世界，人的尘世生活被打发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知识与价值恰恰要靠贬斥当下现实生活而在超验世界确立起自身的地位。这样，人的历史性生存自始至终只能笼罩在超感性经验的“一般”也就是大写的“命运”之下，个体的存在只是确证这个“一般”或“命运”的材料，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命运对个体的统治在中世纪神权对个体的压制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可见中世纪神学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阐释绝不是凭空发生的，它就是响应了他们的理念世界贬斥尘世生活，倾注于超验世界的这种根本特质，经验个体没有获得自己的地位。康德以此提出先天综合判断，肯定经验也应该占有真理的一部分席位，其原因就在这里，也喻示着应该为个体的存在争得一个席位。

明乎上理，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就可以理解为关于人的生活与命运的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康德所倚重的先天形式无非就是人的历史命运或所谓一般性、真实性，而综合则表明必须要关注众多个体的现实生活。先天综合判断归根到底表述的就是人生的价值问题，即个体和命运的关系问题，个体如何面对命运，如何在自身的生存中达到一般，甚至达到永恒。因此，康德认为自己毕生都是在思考三个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最终又可以归结为一个大问题：人是什么，或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可以说“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构成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为了强调康

德对现代性研究的功绩，笔者认为可以名之为“康德问题”。正是基于此种原因，物自体后来面临多种解释，叔本华才把康德的物自体理解为生命意志。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的确是一个“大哉问”。人之为人，必有其不同于其他存在物之处，这就是康德不能回避的一般性，只有这种一般才能把人提升到主宰者的地位，才能体现康德所谓人心中的形而上倾向。考虑到康德对宗教和传统理念论的态度，他所要达到的一般和真实性，就是现代性中的普遍性，这是类似于但又不同于中世纪神学中上帝的本体地位，它是要通过理性而不是神性确立起来的。通过对理性与社会生活基础——拜物教——之关系的审视，经理性确立起来的一般性实际上是一种物化意识，喻示着现代人的命运（社会共同体对个体命运的掌控），也就是经济必然性（命运）主宰下人的地位问题。这在哲学形态中表现为一般和个别的统一，超验与经验的统一，先验存在与人的现实生活的联结。先天的就是一般的，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海德格尔谓之形而上学所代表的天命。康德认为是理性先天形式，随后又说是实践理性，最后称之为审美判断力，甚至是神。普遍性逐级递升，表明康德对哲学、对人的命运的思考最终是想提升人的地位，标榜人之为人的特性，但他不了解现代人的命运不是源自神界，而是源自拜物教。

科西克认为：“到了十九世纪，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即关于人与自然的神秘化观念）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①

康德想达到一个肯定的一般性，可是这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以肯定性形态显现出来，最后仍不得不求救于神。在黑格尔那里，透过浓厚的知识论外衣，仍然可以指认，人的命运问题表现为一般与个别，或个体与类的关系问题。“《现象学》指出，个人是怎样通过痛苦地攀登生命的阶梯，而变成一般和属于同一类的。”^② 此一类已非彼一类，它是现代性的一般，也仍然是现代人的命运。此时，在康德那里作为命运的一般性在这里变成了类，不是神界的类，而是人的类生活，甚至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总体性构成

① [捷克] 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第85页。

② [法] 亨利希·列菲弗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李青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第64页。

原则。只是，黑格尔还是把它理解为理性，而且是绝对理性。个人只有上升为类，过上国家与法所代表的普遍伦理生活，才是现代的。和康德一样，他把人的命运问题之解决视为从个体向类的攀升过程。康德所强调的一般性处于从神学普遍性向现代市民社会总体性一般过渡的阶段，这个一般性多少带有形式主义的强加的意味，人是目的这一绝对命令显得软弱无力。黑格尔彻底去除了这种外在性，把类的生成与个体的生命价值展现同一化为绝对理性的狡计，在一种历史过程中实现一般与个别，个体与类的辩证统一，实际上是希望实现现代社会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和统一。然而，事与愿违，“黑格尔赋予世界精神（它存在于伟大人物身上）以‘践踏别的无辜小花’的权力”^①。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在解决人的历史命运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就是人面对命运如何生活，个体与命运如何达到统一。他们都是想把人的地位实现某种提升，使人趋向一般或达到永恒。在他们那里，人生存在的意义是高高在上的一般性，是肯定性的存在物，是既与的、个体所要追求的目标。实际上，这个先验性的存在只是现代社会总体性构成原则的形而上学表达，并非真正具有超验的先验性，它只能是源自现代拜物教，也即现代生产方式的总体性社会存在，只是对特定的个体来说才具有不可移易的先验性和不可选择性，这种学说遵循一种单个人的直观原则，也即一种先验的主体论。“‘先验的主体’本身已经是一种拜物，是一个‘简化’、并因此也掩盖社会历史实践的复杂过程的实体。”^②如果把这种先在性看做是肯定性的不可变更的命运，这恰恰就是人的异化生存状态，结果是哲学本身陷于主体性形而上学与传统异化逻辑的二律背反而不能自拔。这仍然是不了解现代生产方式的结果，人的命运仍然处于抽象的统治之下。这种哲学只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历史命运做了某种描述，最终仍不能确立人的本体地位，沦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沦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纯然现象的描述。康德所强调的源自感性先天形式和知性先天形式的一般性——时空和知性范畴——究其实质都是资本改造现代社会生活的条件和结果，恰恰是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统治同构的形而上学表现。康德和黑格

① [俄] 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299页。

② [斯洛文尼亚] 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第118页。

尔都不能例外，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详述。无怪乎伽达默尔认为“经济就是我们的命运”^①。

在马克思看来，先天性的一般并非不可变更，并非源自理性或神旨，而是源自现代生产方式，也就是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这个一般性恰恰相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最终所要趋向的意义所在，而是一个否定性的存在物，是特定的生产关系对个体的奴役，它在一定历史时段促发了人的自主性和实现了个体的价值，但以历史的眼光看，人仍然只有在自己的历史性生产实践中破除这种强制性的一般性对个体的奴役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解放。去除先天性的一般，也就是破除现实生活中的强制命运——资本拜物教。可以说，马克思对“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现代性中人的命运问题的解决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的。人的历史命运与个体的自由发展表现为历史规律与人的实践活动（目的是实现对这种经济必然性的扬弃）之间的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辩证运动。从康德到黑格尔，理性都只是趋向命运，而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则真正把握了命运。

由上可知，从康德到马克思的现代性解决方案在纯哲学的意义上（也就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确是在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路子上进行的，只是马克思突破了这种抽象的理解范式，自始至终把它与对人的历史境遇的思考结合在一起。历史辩证法应该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的确改变了以往哲学的提问方式。它仍然不能回避一般与个别、共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不但不回避，而且还将其视为中心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人的历史命运加以反思。

当马克思破除以往笼罩在人们的头上的先验性的一般，认为它应该在现实的商品、资本生产中得到科学的透析之时，现代性中人的命运问题转换成了人的生产活动与现有的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社会关系的总体性生成原则和以往形而上学的基础得到了彻底澄清，甚至可以说这二者就是同一个问题。此时一般性的存在只能是人的生产活动，尽管当前它以否定性形式表现为现代拜物教，其肯定形态只有在破除了现有的生产关系之后才能出现，那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绝不是黑格尔理性所代表的现代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的抽象统治仍然是一种不自由的人之

^① [德] 伽达默尔：《1782～1982年间的宽容思想》，见夏镇平译《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15页。